



明天,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4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再次编发一个“整版”“亲历与见证——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以此纪念那个光辉的日子。每一个作者亲历的事件都是时代的印记。在这些鲜明的印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大潮,以及伟大祖国更加璀璨的明天。

——编者



一场生动的教育改革

■张长春

出的都是无价的青春年华,难道不该讲些个人利益吗?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有一个同年兵站起来说,我有不同看法。徐向前一个开国元勋,战功赫赫,他的故居却是那么几间简陋的房子。和徐帅相比,我们的付出不是沧海一粟吗?作为新一代的革命军人,我们应该弘扬先辈的传统美德。

片刻之后,第三个战士说,对这个话题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回家探亲时,他为了省下五角钱去坐大巴,被中巴售票员戏称为“穷当兵的”,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如果我一个月拿四五百元,不要说坐中巴,打的也没问题,就不会这么丢人了。

这个故事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场开始热闹起来,大伙儿交头接耳,每个人都有话想说。这时,又有一名战士站起来说,我也讲个故事。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他说,前不久我探亲时在火车站订票,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冲着人群问谁是解放军,我跑过去拉着大娘的手说我是解放军。她用手摸了摸我的衣服和帽子,确认是解放军后,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在我手里,让我帮她买票。这名战士用自豪的口气说:“亲爱的战友们,军人在人民心中是有分量的,当我们穿上军装时,不仅是一种奉献和牺牲,更是一种荣耀和自豪!”顿时,会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发言中,有讲切身体会的,有算账对比的,有争论辩驳的。主持人进行小结时,综合大家的观点和看法,把思想统一到拥护支持改革上,统一到军人的奉献“献”有所值上。

部队的辨析讨论热火朝天,工作组的同志也像在组织一场战役,指挥一场战斗。白天分头参加辨析讨论,晚上召集会议综合情况,把辨析讨论的成果梳理出来。除此之外,军区工作组的同志每天都要开几个大大小小的“碰头会”,不停地汇总情况,集思广益,不停地想点子、出招数,对工作的“上心”程度、严谨作风和不怕吃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践证明,这次教育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的。讨论辨析牵引官兵进行了一次自发的大学习。由于教育把“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官兵既当学生又当先生,真正成了教育主角。为了教育自己,也为了说服别人,官兵们自加压力,认真学习 and 思考,有的把前几年的报纸翻出来,仔细查阅资料;有的到地方图书馆借来理论书籍阅读;有的走在路上、坐在饭桌上也在谈论教育内容。

讨论辨析让官兵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思想的碰撞所收获的不仅是现实问题的解决,还积淀了认识问题的辩证思维,科学方法。用团领导的话说就是“鱼”与“渔”兼收。大家在利益问题上站得高了,把个人得失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看得远了,懂得牺牲眼前和局部利益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想得全了,充分认识到军人也是改革的受益者,消除了一些同志在待遇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失衡心理和埋怨情绪。这种“高”“远”“全”的思想方法,不仅是解决利益问题的一把钥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强大武器。

讨论辨析激发了官兵敬业奉献的精神动力。一些觉得付出多、吃了亏、劲不足的同志,感到过去在利益得失上账算错了,理论歪了,主动检讨了在敬业精神、工作态度上存在的差距。教育期间,部队自上而下推荐好人好事,点点滴滴见精神,件件好事实正气,爱岗敬业、争先创优的干劲得到有效激发。

讨论辨析还增进了官兵情感。平等交流让官兵打开了心扉,不仅交流了思想,也交流了情感,相互之间的理解多了,信任多了。一些干部听了战士家庭的困难,感到自己对战友关心不够,积极为战士办实事、解难题。一些战士理解了干部的苦衷,主人翁意识也大大增强,更加关心部队建设,更加支持干部工作,形成了团结友爱、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这次教育改革使我深深感到,尊重官兵、相信官兵、依靠官兵,真正让官兵成为教育的主人、成为部队建设的主人,确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一大法宝。

法治建设的春天

■张建田

1983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从基层部队调到解放军军事法院工作。由于接触许多立法建制、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工作,使我对我军可否参照国务院的做法设立一个专门办理法制工作事务的机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与同事们一起写了一篇建议中央军委立法制工作机构的大内参。其中写道:“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对军队法制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重。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我们认为,军委成立一个领导全军法制建设的工作机构,是很有必要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阐释了军委立法制工作机构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提出了军委法制工作机构的主要职能和担负的任务。文章引起了军委机关首长的重视。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之后,国家法制建设的步伐全面加快,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相继成立或者恢复法制工作机构,各个领域的立法进度明显加快,使军事法制建设不适应的矛盾日渐突出。

为此,我们又重新起草了《建议尽快建立军队法制机构》一文,刊登在1987年12月15日的军报内参上。为了增强建议的可行性,我们还对军队法制机构的设立提出分阶段、分步骤运作的建议。

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这篇文章刊登在学术殿堂上。他们中有的是为了收集条目录资料和配图,他们中有的为了跑遍几千公里的边防区;有的为了查证条目录中的一句话,翻阅学科领域几十万资料;有的为了核对条目录资料来源,遍览国内外相关网站海量原文信息;有的刚刚做完手术就在病床上修改条目录……这是一项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事业,需要将青春、学识、心血,凝固成每一个字、每一个条目、每一本书,熔铸成这座军事知识宝库的每一块基石。

我曾读过一本书,在讲述一本辞典的编辑工作时,作者写道:“生命有限的人类,在浩瀚深邃的语言之海上齐心协力,划桨前行。虽然志忑不安,却也十分快乐。不想停下,为了更加迫近真理,希望一直乘着这艘航行下去。”书中向工具书编纂者表达敬意的这些话,道出了编纂大型工具书的艰辛和快乐,也鞭策着自己为了这一事业的传承而继续努力。

1988年6月8日,中央军委下发了

成立中央军委法制局的6号文件,明确规定了中央军委法制局的职能定位和担负的主要任务。6月24日,中央军委法制局正式启动新印章,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法制局”,新印章上的“国徽”标志格外醒目。

1988年8月2日上午,我从解放军军事法院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报到,参加了军委法制局首次办公会议。大家以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投入到新机构的建设和工作开展中。

1988年7月11日,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图们同志出任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朱阳明为中央军委法制局副局长。在军委法制局初创期间,全局同志艰苦创业、努力工作,贯彻边建、边干、边学习的方针,在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参与审查、研究法律法规草案,研究制定国防和军事立法规划、计划和立法程序,召开军事立法工作研讨会,培训法制业务干部,组织全军法规清理汇编、军事法学研究等工作,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30年来,军委法制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坚决贯彻军委依法治军方针、认真履行军委赋予的职能和任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军事法治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充分证明,军委当年关于组建军委法制局的决策,顺应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趋势,反映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抚今追昔,心潮起伏。我的军旅生涯伴随着军委法制局的诞生,成长而一路豪情一路歌”,直至2011年底退休才离开这一朝夕相处、难以割舍的“娘家”。时至今日,我对这段时光总是难以忘怀,对自己能够参与当年的筹建工作,并与历届领导和同志们努力拼搏工作20多年而感到自豪不已。



特战硝烟

■尹武平

这是20年前,我在西北戈壁荒漠上所经历的一次演习。

两点像断了线的珠子,尽情向这无垠的戈壁荒漠飘泻着,使初秋的塞上平添丝丝寒意。贺兰山下,昔日的古战场上,一场现代条件下边境反击作战演习即将展开。

我作为军区特种大队大队长,当时正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牛首山下的一座野战指挥所里,眼睛紧盯着“902”战场电视侦察系统对“敌”阵地上传回的实况视频。在屏幕上,只见我左路特种破袭分队已先期秘密抵达潜伏地,在“敌”导弹阵地前伪装成戈壁荒漠浑然一体;我右路特种破袭分队已渗透进距“敌”通信枢纽两三百米的有利地形上。这一群特种兵如大漠之狼,几十双眼睛死死盯着猎物,只等我令从出口,便会迅速扑向目标。在前方运用技术侦察手段传回的画面中,我看到“敌”一辆巡逻车,满载五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其导弹阵地与通信枢纽之间往返巡逻,严密警戒着那些重要目标的安全情况。

“我空中突击分队的情况怎样?”我抬头问身边的杨参谋长。“空中突击分队已在百公里外野战机场登机完毕。只要气象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升空。”杨参谋长回答。“气象条件怎样?”我问道。气象中心主任报告:当前持续中雨,3小时后有望好转。这个天气向好的报告丝毫没有减轻我心中的压力。空中特战突击分队的行动不仅关乎破袭作战的成败,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进程。在这凉飕飕的野战指挥所里,我的额头上竟不知不觉地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我索性伸出指挥所,抬头透过伪装网眼,向牛首山方向望去。只见一片片低沉的乌云翻滚着向我的头顶压来,耳边只有雨点时紧时松唰唰落地的声音。唉!这老天像是有意给我们完成任务增加难度似的。演习地区本来是十年九旱之地,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00多毫米,现在可好,下了十多个小时了,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我感觉肩头的分量又沉重了许多。在此次战役演习中,上级赋予特种大队的任务是:组成精锐的特种作战力量,运用多种方式渗透“敌”阵地,相机破袭“敌”重要

目标,为主力全歼当面之敌创造条件。这也是特种大队改建一年来的首次“亮剑”。

1994年,我们团奉命改建为兰州军区特种大队,我被任命为第一任大队长。我清晰地记得部队刚改建不久,一个数九寒天的夜晚,我穿着皮大衣带着皮帽子去查铺查哨。路过特八连的宿舍前,发现十几名战士竟然光着膀子在练擒拿格斗。我走上前去轻声询问:你们怎么不穿上衣啊?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一位班长回答:大队长,我们在进行耐寒训练,加训训练是为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特种兵。多么可爱的士兵啊!我心头一热。这个连队真不愧是中央军委命名的“团结战斗模范连”,我们的特种兵使命感之强、练兵积极性之高,深深地感动着我、鞭策着我。作为带兵人,我要把士兵中蕴藏着的这种巨大的潜能与积极性,通过严格训练、科学管理,使之尽快形成特种作战能力。这种作战能力到底形成了何种程度,一会就要接受实际检验了。我越想心头压力越大。

此时,距演习正式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指挥所内无线电正保持静默,大家都凝神静气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着行动开始的命令。指挥所外风停了,雨住了,阵地上死一般的寂静。

“天狼注意!开始出击!”当时时针指向16时整,我按计划下达了命令。

此时,我向右前方“敌”阵地看去。当“敌”巡逻车近前时,一名特战队员腾空跃起,飞起一脚将驾驶员踹翻下车,数名队员一拥而上。一名“敌”兵企图逃跑,只见一名特战队员手起枪响,“敌”应声倒地。紧接着,这群特战突击队员犹如饿狼猎食一般扑向“敌”通信枢纽。

再向左前方“敌”阵地望去,我左路特战突击队员个个像猛虎下山一般扑向“敌”导弹阵地,他们时而滚翻时而跃进,时而交替掩护时而隐蔽接“敌”……

继而向“敌”纵深眺望,只见空中朵朵白色伞花飘然而至,准确落在预定地点,特战队员脚踏落地便迅速甩掉伞衣,按照预案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

霎时,在这狭长的通道阵地内炮声爆炸声声震耳,枪声喊杀声喇叭声混成一片,仿佛要将这狭长的通道撕裂一般,只见滚滚硝烟腾空而起,翻滚着弥漫着……

“黄河!我是天狼,我已完成任务!”无线电波把突击队长的报告传送到我的耳中。“撤出战斗!”我当即命令。只见后方三架直升机轰鸣着快速临空,特战队员迅速登机完毕,直升机迅即翘起尾巴,轻盈地腾空撤出。

“打得好!特种大队是好样的!”时任军区首长从观礼台座位上站起,对着麦克风说道。那洪钟般的声音在牛首山下久久回荡着,这是对特种大队快速形成作战能力的褒奖!从此,西北大地上有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特种作战力量。

在返回营区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回望刚刚战斗过的方向,只见夕阳把天际边的云彩烧得通红通红,刚才的硝烟与彩云连成一片,犹如一幅恢宏的画卷。在那画卷中,我似乎看到我们的前辈一代又一代在抗日烽火中勇击寇酋,在解放战争中前仆后继,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边境作战中奋勇杀敌,我更看到今天的特战队员气壮如虹的使命担当……



岁月如歌(水彩画)

关维兴作

长征

第4387期

潜心耕耘40年

■关泠

今天,回顾《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历史,逐一点开这些精确的时间节点,我常常为那背后的一串串数字而感到震撼。《军事卷》第一版分上下2卷本,收入2924个条目,总计376万字,历时9年完成,参加撰稿的专家学者3000多人。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共11个卷本,收入1.1万个条目,释文1500多万字,历时11年完成,有5000多名军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编纂工作。《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出版19个卷本,有3万个条目,3600余万字,1万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编纂工作。

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确立了中国军事百科知识体系,并对一些重大的理论观点、历史事实,以及涉及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等敏感问题,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和军委、总部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妥善、慎重地予以解决。如:1986年10月,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表示赞成不在《军事百科全书》中设立“军事人物”条目,对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题写了书名。

空军党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确认1949年11月11日为人民空军成立日。在条目编纂中,还对战争起源、海空战略、战役的产生、武官的历史渊源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考证和深入探讨,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在中国军事百科事业创立和发展近40年的历史中,为了保证编纂成果的权威、科学,为了维护百科全书“工具书之王”的美誉,很多人始终在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

在《军事卷》第一版编纂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以及110多位高级将领,都曾撰写或审定条目。钱学森是“导弹”条目撰写人,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拟定了7000字的条目释文初稿,还虚心听取多方意见,认真进行修改。为了更方便读者查阅,他还设计了导弹分类图表。在《军事卷》第二版学科条目审稿会上,曾经有7位院士为了一个条目中的一个关键性数据争论了整整两天时间。参加《中